

一、混沌初开的小学与中学时代

江苏省如东县掘港市的西面，约十华里处的虹桥乡，有一四面环水的小村庄。虽说是村庄，其实只有一户人家，住着兄弟两人。大哥胡兆沂先生早年曾留学日本学法律，辛亥革命前曾在山东作过几年法官，辛亥革命后先后在北京、上海当律师。兄弟胡兆森基本在老家管理家务。1919年1月某天，胡兆沂先生的夫人金氏临盆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胡济民。胡老夫人这已经是第四胎了，前面有十一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一个七岁的儿子。她身体比较虚弱，在小儿子六岁时就不幸生病去世了。六岁的胡济民失去了母亲，但有比他大得多的哥哥及两个大姐姐爱护着他；父亲对幼年失母的小儿子也特别怜惜，亲自照顾他的起居，不愿意续弦，一直到胡济民高中快毕业时，才与一位女子结婚。他叔叔家除了有四个比较大的堂哥哥以外，还有几个年龄与他差不多的堂姐妹与他一块儿玩耍。那时候，他家与叔叔家还没有分家，为了几个较小的孩子，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教他们识字用的课本有《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虽然念的课文孩子并不懂，但这位老先生却很会讲故事。例如，讲《滕王阁序》时，大讲当时洪州都督阎伯屿如何与作者王勃为难的故事。那位都督本想让他女婿出出风头，不想年仅十四岁的王勃却不客气先写了出来。他女婿也是一个人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看一遍就能把王勃的《滕王阁序》一字不差地背出，因而诬陷王勃抄袭现有文章，而王勃最后随口又念一首诗来赢得胜利。

等等。这些古代神童的故事使孩提时的胡济民无限神往。

那时，家里大一些的孩子都离开家到南通或上海念书，在家的孩子非常盼望寒假或暑假来临，盼望哥哥、姐姐们回家来。他们一回家，家里顿时生气勃勃，白天可以跟着哥哥们到河边去钓鱼，晚上可以听他哥哥及大哥哥讲故事。胡济民的哥哥元民最善于讲《水浒》与江湖奇侠传，可以听得他们废寝忘餐。与哥哥比赛背诵水浒的回目是胡济民小时候一大乐趣；比他大七岁的哥哥常常喜欢逗小弟弟，先说一句回目的上联：

“和尚倒拔垂杨柳，”得意地看着小弟弟。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小弟弟随口跟上。有时反过来小弟弟倒先说起来，小弟弟很希望难倒哥哥，预先记点比较偏僻的回目。

“石将军村店寄书，”小弟弟大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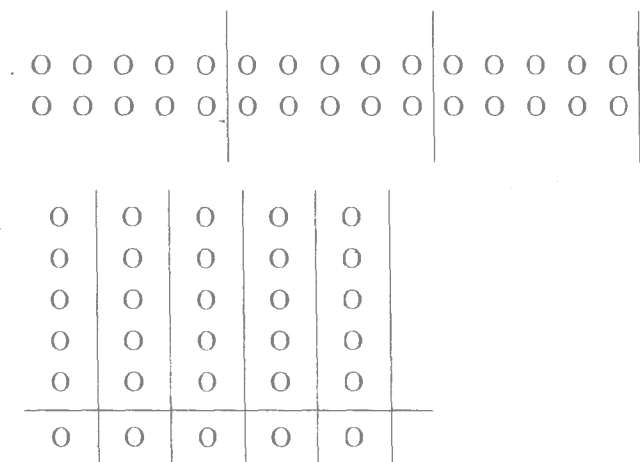
“小李广梁山射雁。”对《水浒》滚瓜烂熟的哥哥是很难难倒的。

大哥哥是他叔叔的大儿子，讲起《岳传》来更是眉飞色舞，有声有色，不但吸引了孩子，也吸引了家里的所有大人。夏天月夜，清风徐来，在院子里围坐着，一面乘凉一面听大哥哥讲《岳传》是他们一群孩子最最开心的事。

大姐与二姐都爱好诗词，大姐更能画一手颇有风采的水墨画。在两位姐姐的潜移默化下，幼年的胡济民就爱好诗词，以后他不但能背诵很多诗词，还能随口说出诗词作者及有关故事。当他已经做了爸爸时，孩子最喜欢让爸爸抱在怀里，一边踱步一边嘴里念着诗词；大女儿小文呀呀学语时，看到爸爸回家，就要爸爸抱着躺在他手臂上，大眼睛看着爸爸，小嘴巴不断催促：“汉！汉！”意思是要爸爸念白居易的《长恨歌》：“汉王重色思倾国……”等爸爸抑扬顿挫地开始念起来时，她还会随着爸爸的声调

和上每句的最后一个字“...国 ,...得 ,...成 ,...识 ’等等。但常常是《长恨歌》还没念到一半 孩子已安然入睡。

两位姐姐觉得这个小弟弟在家里只会认字，太差劲了，就抢着教小弟弟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也许是为了卖弄自己在中学里学的知识，也许是为了难难聪明的小弟弟，她俩特别爱出难题给小弟弟做 有一次 出了一个什么“ 农夫刈草 ”题 即有一块地的草，三个农夫割需两天割完，问五个农夫割需要几天？这样的



题给今天学了代数的小朋友做，大概不费吹灰之力，可对那时只有六、七岁又没有正式学过算术的胡济民来说，却的确是个难题。两位姐姐很想给小弟弟讲解，等着小弟弟来叫苦。可是胡济民从小有股子犟劲，他并没有谁学过什么谁没学过什么的概念，他只是想 你们能做的题我一定能做 他趴在桌上冥思苦想 满脸通红 额头上渗出点点汗珠 纸上画满了圈圈线线 当他两个姐姐去看他时 他抬起头对姐姐们说：“我做出来了。”他的做法

很巧妙，他画了像上面所示的一个图，用五个圆圈代表每个农夫每天割完的草地数，为什么用五呢？因为以后要五个农夫收割，草地数要能被五个农夫分得开，这样三个农夫割两天共割完三十个圆圈的草地，这三十个圆圈的草地让五个农夫割，每个农夫须割六个圆圈，但每个农夫每天只能割五个圆圈，剩下一个圆圈需要五分之一天的时间割完，因而答案是一又五分之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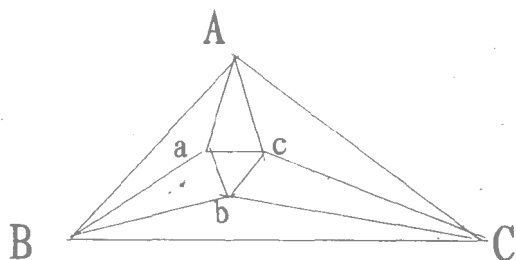
十岁那年，家里辞退了那位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父亲带他到上海念书，插班进了小学五年级。对读了几年私塾的他，语文是绰绰有余 对一些历史、地理等知识的课 也是兴致盎然。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先生给他们讲的世界史，至今记忆犹新；陈先生面对十几岁的孩子，像对大人一样讲解当时的世界形势，精辟地分析美国和日本的矛盾，给他以极大的兴趣。但算术课却给他带来了比较大的困难，什么鸡兔同笼，什么分针秒针的分开和重合，等等等等四则算题，搅得他晕头转向。但幸亏有他两位姐姐教他的一点底子，也没有难倒聪明的胡济民，听不懂老师的讲解时他会想出自己独特的办法来解决，很快他不但跟上了班，而且最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

中学进了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中学的特点是很重视英语与数学 英语除了教科书 用的是林语堂编写的教科书 外 还发给每人一本希腊故事 (Greek Stories) 这本希腊故事太吸引孩子了，什么九头龙，什么狮身人面像，什么用蜡做的翅膀飞上了天等等。虽然老师对这本书讲得并不多 但胡济民几乎把每个故事都看了。高中时还可以选修大学的英语，用的课本是 C. Dickens(狄更斯 写的《David Copperfield》(大卫·考伯菲尔 德)这是一本原装书 中间有很多插图 厚厚的一本 非常吸引人。老师还让大家回答：“假如你是大卫 你喜欢谁做你妻子 爱葛妮丝 (Agnes) 还是朵拉 (Dora)”，大卫与朵拉的恋爱比较浪

漫，朵拉像一朵嫩弱的花；大卫与爱葛妮丝的恋爱比较温暖，爱葛妮丝像个大姐姐。大学生们大多喜欢朵拉，在青年人的心灵里，大概觉得不恋爱则已，要恋爱就得浪漫一点；幼年就失去母爱的中学生胡济民 温暖胜过浪漫 他选择了爱葛妮丝。

除了英语课外，别的教科书也尽量用英文原版。自然课用的是一本原版教科书《*Real Things in Nature*》翻译成中文即“自然界的真事”。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在老师的讲解下，一个充满了奥秘的自然界展开在孩子们的面前。

胡济民在中学时代碰到很多出色的数学老师，使得中学的代数与几何课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奇妙的数学天地。记得那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上常会出一些很费周折的几何题，他们的几何老师吴在渊老先生，就在课堂上分析这些题并带领学生做各种不同的答案；这类几何题是很磨练人的逻辑思维的。当时大同大学数学系的学生也常在他们所出的墙报上登出一些类似的几何题，引得中学生常去把这些题拿来争论得脸红耳赤。吴老先生当时年老多病，有一段时间由他儿子吴学蔭代课。这位小吴先生更是喜欢给学生出课外难题，如什么“马尔法底问题”，即如何用几何作图法在一任意三角形中作三个相互相切的圆，这三个圆又分别与三角形的两边相切；这类难题引得少年时期的胡济民几乎废寝忘餐，真有不证出誓不罢休的劲头。有一个几何题，如下图所示： ABC 为一任意三角形， Aa 、 Ac 、 Ba 、 Bb 、 Cb 、 Cc 线分别把三角三等分 求证 abc 为等边三角形。他当时没能证明，引为憾事，离开中学后也没有时间再去花费时间证明，但他把这题一直记在脑子里。几十年以后，1977 年 帮助孩子考大学复习几何时 灵机一动 豁然开朗 他想起了那题 并且证明了出来，欣慰之情，无以言表。吴学蔭先生教了一段几何课后就出国留学去了，解放后在冶金部门工作。



给胡济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代数老师，可惜只记得音容笑貌，却忘记了他的名字，那时这位代数老师，从大学毕业不久，他教的代数也是别开生面，如讲对数时，不光教学生如何应用及如何查对数表，还要告诉学生对数表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告诉学生如何用心算的方法估计其结果。讲圆周率 π 时，也讲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并绘声绘色地述说了古今中外计算圆周率的故事，我国古代东晋时的科学家祖冲之用算盘加竹签就算出了小数点后十三位。

老师，特别是中学老师，真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不但给了中学生——一群正向人生道路上起步的少年——具体的知识，往往还赋予他们一生的追求目标，一生的兴趣所在。大同大学附中那几位可尊敬的数学老师大概不会想到，就是因为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胡济民一生都喜欢做难题 追求做难题 喜欢心算，他不但可以心算两位数的平方，能在脑子里解几何题；并且在以后的一生中，不管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他都能坚持不懈地思考科学问题，不但赢得了时间，而且得到了生存的乐趣。

胡济民也喜欢上国文课及历史课等。那时的语文课与现在很不相同的是，没有那么一些语法修辞之类的东西，老师讲课像

在讲故事。初中二年级时一位老师讲国文 讲了一学期的《项羽本纪》 听得少年学生入了迷 课后纷纷去找各种课外书阅读。胡济民丰富的历史知识的积累 是从中学里开始的 很多知识来源于课外阅读 但课外阅读的兴趣却来源于老师课堂的启发。一个老师能达到使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在于给学生灌输多少知识，而在于启发学生去主动获取知识。1995年 郑州大学请胡济民讲学，结束后由郑州大学物理系教授、原来北大技术物理系的学生高正耀陪他去少林寺玩，寺外有座塔林，是少林寺历代高僧的坟墓，每座塔的墓碑上写着该高僧圆寂的年代，年代是用当时的皇帝的年号记的，但并不写朝代。胡济民一看皇帝的年号，就能说出是那一朝的皇帝，并或多或少说点有关的故事，听得高正耀非常惊讶，想不到这位胡老师不但懂核理论，原来还有那么丰富的历史知识。

那时候的中学与现在不同，课后没有很多作业，胡济民的少年时代与一般的少年一样，爱打打乒乓球，下下围棋，也爱赶热闹看个演出。德国的海京伯马戏团来上海兆丰公园附近演出时，胡济民与一个平时很合得来的同学商议着要去看一次马戏。马戏团的票价很贵，一张票的钱够一个中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不是普通学生能买得起的；但报纸的广告上说，还有一种便宜得多的票 买了这种票 不是看马戏 而是看后台的动物。他们决定买这种票，也舍不得再花钱坐汽车，两人从地处南市火车站旁边的学校一直走到兆丰公园，整整走了半天，终于如愿以偿，看到了真真的老虎、狮子、狗熊等等。虽然它们都懒洋洋地在休息 并不欢迎这两个热心的、对它们朝思暮想的少年。

在课余时间 胡济民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旧书店。那时上海老西门有很多旧书店，是胡济民几乎每周必去的地方，在那儿不但可以浏览各种各样的书籍，喜欢的书花钱不多就可以买回来。有

一次在旧书摊买到了一本日本人编写的《大代数讲义》。胡济民如获至宝，抱回来后就认真地读起来。这是一本大大超过中学水平的书，给他提供了一个无限美妙的数学天地。

1931年胡济民初中二年级时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国东三省，而蒋介石反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上海的大、中学生罢课示威，并到上海市政府门前去请愿。胡济民当时是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少年，个子不高，比较瘦弱，但在请愿的大队伍里，自己觉得长大了很多，仿佛自己已成了一个大人，感到一个人不能只顾念书，除了念书以外，还有着很多事情需要管，包括国家大事。请愿当然没有多大效果，只是市政府负责人出来应付一下完事。上海的学生还准备去南京请愿，中学生们也义愤填膺地想去，给学校劝阻了，结果只有大学生们去了南京。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很大的，而且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时在上海流传着日本首相田中对天皇的秘密奏折，传说是一个在机要部门工作与中国人友好的人偷偷地给中国人的。田中奏折中明目张胆地说：“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要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胡济民在小学时就曾在哥哥那里看到过这奏折的油印件，知道日本占领东三省就是侵略整个中国的前奏，因而对蒋介石拱手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切齿痛恨。当时全国抗日的呼声很高，而国民党卖国政府却对日本一味地谄媚巴结。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就是沈君儒、章乃器、史良等七人因主张抗日而被捕，经宋庆龄的营救才得出狱。

当时还有轰动全国的杜重远事件。杜重远不仅仅是个左翼文化人，而且是个爱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有抗日倾向而被查封后，利用杜重远的社会关系，《生活》周刊的后身《新生》周刊由杜重远出面主编。《新生》周刊上刊

登了易水的一篇散文：《闲话皇帝》。正当胡济民和他的同学们对这篇文章大为欣赏的时候，却传来消息说：日本人提出该文污蔑了他们的天皇，国民党政府就拘捕了杜重远，判了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的徒刑。这一切越发使年轻人对卖国政府不满。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大家额手相庆，高兴得不得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能果决地教训一下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

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号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给少年时期的胡济民最深刻的感受，不是满街的霓虹灯的闪烁，不是在乡下老家从没见过的繁华，而是一种心灵上的屈辱。商店的货架上摆的几乎都是洋货，外国人及外国军警在大街上趾高气扬。每逢近代史上的各个国耻纪念日，被中国人称为次殖民地的租界都要戒严，外国军警在马路对中国人堂而皇之“抄靶子”（即搜身）。屈辱啊！中国人的这种屈辱到底要忍受到何时？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扬眉吐气？

胡济民小时候体弱多病，在中学时代生了两次大病，一次白喉，一次猩红热，大病耽误了他一年的学习，因此中学时代过了七年。

胡济民以优越的成绩高中毕业了，考上了浙江大学化学系。在考大学的问题上胡济民与他父亲略有点矛盾。父亲希望他考医科或工科等比较实用的学科，可那时他最喜欢的是数学，医科是无论如何不愿去学，因而折中考了理科化学系。当时的一般看法，总觉得理科中的化学系是比较实际有用的；高中时，胡济民也比较喜欢化学，高中的化学课是同济大学校长曹惠群先生按他自己编写的书讲解的，课讲得很生动。印象特别深的是在讲到氨的合成时，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由于战争，要做 TNT 炸药，原来从智利进口的硝石断了来源，没有了

原料，德国就利用其先进的化学工业用氨的合成来解决问题，这让人深深感到化学工业的威力。其次，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当时，民族资本家吴蕴初先生的天厨味精公司设了一项奖学金（大概有十个名额），凡是考上这奖学金的人，又考上了大学的化学系，每年就有一百元钱的资助。胡济民父亲是个律师，私人开业，收入不多，一百元的资助还是蛮吸引人的。胡济民是大同大学附中唯一考上这奖学金的人，也是浙江大学化学系唯一得这奖学金的人。

二、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涯

1937 年秋，胡济民进进了浙江大学化学系。1937 年对中国来说，正处在一个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正大举进攻我国。国民党政府终于改变了多年一心打内战的政策，在民族危机面前，国共终于合作抗日了。当时像胡济民那样的青年学生心情都非常激动，觉得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中国。但战火一起，蔓延很快，杭州已不安全。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先生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人，他决定带着教师、学生、图书、教具一起迁校。胡济民进浙大不到一个星期，就由学校用汽车从杭州运到西天目山的一个大和尚庙里。浙大把庙里的所有空房子都租赁下来，原来备供香客或游客住的较大的客房改成了教室，一间过堂大殿做了学生的体育馆。一年级的大学生们就在这和尚庙里不但学起了科学，还翻筋斗、仰卧起坐、俯卧撑、锻炼起身体来了。杭州有著名的南高峰和北高峰，天目山有东天目和西天目，大庙门口的对联上写的：

南高峰 北高峰 南北高峰齐俯首，
东天目 西天目 东西天目照禅心。

仿佛是这位竺老先生也是这群莘莘学子们的写照。

当时，大学里实行导师制，对每个大学生都指定一位老师作

导师。这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不同，并不是管学生的业务学习，只是让一位教师关心几个学生而已。胡济民的导师是朱庭祜教授，他是搞地质地理的老师。他为人和气，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把他负责的几个学生带出去玩，一边爬天目山，一边拣石头，还讲些如冰川摩擦之类的地质知识。天目山是座很雄壮很美丽的山，爬上西天目山的最高峰，极目远眺，但见云雾缭绕，低处浓密的竹林仿佛是铺在山谷上的葱绿的地毯，在云雾中时隐时现；漫山遍野的松柏树 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山顶上白雪皑皑 朔风呼啸，顿时把大家身上的暑气一扫而光。山腰上有一棵大柏树，称为“大树王”用铁栏杆围住 据说已经有树龄几千年。朱教授还带他们去东天目山的和尚庙中去玩，和尚们请他们吃了一顿素餐。这也许是胡济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素餐了，就地取材，新鲜的香菇 新鲜的木耳 新鲜的竹笋 自制的豆腐 这风味是城市里任何家庭任何餐馆都无法炮制的。胡济民一辈子很喜欢石头，以后到任何地方去，看到有石头就要拣，这大概就是朱教授的功劳；三年困难时期，胡济民去烟台出差，回来时拎着颇重的行李袋，他夫人和孩子们都很高兴，以为这一回准有美味的烟台苹果品尝了，谁知行李袋里拿出的是一包又一包的石头，苹果也有一些，是在招待所门口买的小苹果，比石头子大不了多少，根本体现不出烟台苹果的特色。

庙后有一楼 名为来青楼 冯乃谦教授在这楼上为数、理、化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从楼上窗户往外看，一面是苍松翠柏，峰高入云，一面是庙堂僧舍 暮鼓晨钟 下雨后山上有很多山水，白练似的山水在树丛中时隐时现 哗哗、叮咚之声不绝于耳 让人不禁想起王维的诗句“山中一夜雨 树杪百重泉”来。

可惜好景不常，不到两个月时间，日本军占领了安徽的宁国。宁国就在天目山的西麓 天目山已不是久留之地 浙大的师

生们向南转移。开始，一年级的学生们每人背着一枝军训用的枪步行，身穿一色的黑呢校服，帽子上还有一鹰状的校徽，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满腔仇恨，颇有些雄纠纠气昂昂的气概，引得周围老百姓们以为是哪儿来的抗日队伍。走了一天到了于潜县，肩膀也肿了 腿也肿了 疲备不堪。第二天把枪交给了地方部队 从于潜坐船到桐庐。在桐庐休息了一晚后，大家精神焕发，兴致勃勃地沿富春江徒步向建德进军。富春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使年轻的大学生们目不暇接。但是从清晨一直跋涉到夕阳西下，建德城还没有影子。古老的道路一般都用凉亭来标志离县城的距离，当大家看到路旁一个七里亭时，不由得一片欢呼。这最后的七里路程，大家用疲乏的双腿整整走了一个小时。

到了建德，与早在那儿的高年级学生会合，马上就上起了课。在建德待了约两个月 学校又开始行动 坐船到了金华 从金华准备乘火车到江西吉安。学校包了若干火车车厢，学生们坐的车厢是装货的车厢，没有坐位，每人拿着自己的铺盖卷，既可以当坐位又可以打开凑合睡一觉。那时火车主要保证军用，对浙大的车厢放在很次要的地位，有空了就拉你一段，没空就扔在一旁。学校给每个学生每天发两毛钱的伙食费，学生们也轻易不敢下车，就在绕着火车转的小贩们手里买点吃的。火车这样的走走停停 把有些学生惹火了：“这样的老牛破车 还不如走路痛快！”有几个心急的同学已征得领队的同意沿着铁道步行了。胡济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他能在任何环境中找出自己生存的乐趣，他安心心地在自己的铺盖上拿着一本书看着，心里列起一个方程式，计算着那几位走路的同学需要什么速度才能赶上火车。当火车到达江西玉山时，那几个步行的同学已经到达多时。

火车到了江西樟树市后(当时叫樟树镇)改从赣江坐船到吉安。那是一种能坐十几个人的小帆船 为了要等学校的一些教

学设备等等 胡济民坐的船在樟树镇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停泊的几天里 同船的十几个人自己解决伙食问题。早上 大家一起上岸买些早点吃，一般都是买一种外面粘了芝麻中间经过油炸而形成很多空隙的‘麻糖’吃，可千万别嘴馋去吃肉包子。有一次一个同学买了包子，一口咬下就张着嘴合不拢了，原来包子里包的全是辣椒。吃完早点 大家就去为中餐与晚饭采购。时值冬天，萝卜又好又便宜，大家就买了一些肉、萝卜和米，回船后的中餐与晚饭就吃一大锅萝卜烧肉，倒也别有风味。开船后的伙食由船家供应 就远不如自己动手的了。船大约走了五、六天 胡济民的铺位安在船头板下的底仓里，这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的地方，他却说这儿有很大优点：安静，而且白天起床后不用卷铺盖。但老天不作美，下起了雨 船头板挡不住雨水 胡济民的被褥全湿了，狼狈不堪。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济民犯一种莫名其妙的脚疼病，睡觉时脚一热就疼得要命，医生也看不出是什么缘故，大概是在船上受潮受凉引起的。

船直接开到吉安市的白鹭洲 这是赣江中的一个小岛 与吉安市隔水相望，岛上绿树成荫，风景优美，唯一的建筑就是白鹭书院。原来在书院办的师范学校正放寒假，浙大就在白鹭书院暂时安顿了下来。大家松了一口气，从离开建德以来，路上已经有一个多月，一停下来就有到了家的感觉。师生们忙着准备期末考试。考试完了，大家又往泰和县转移。在泰和也是借一师范学校的校舍上课，上了整整一学期。那时理科学生都在一起上课 学的是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英语和国文。国文用的是曾国藩选的《经史百家杂抄》 其中一篇庾信写的《哀江南赋》给胡济民很深的印象。

南北朝时 南朝皇帝梁武帝晚年信佛 军政荒芜 军阀侯景作乱 都城南京被破 梁武帝饿死台城。当时各地勤王之师有百

万之众，但因缺乏统一指挥，不能打败兵不满十万的侯景，战火使原本富饶的江南生命涂炭。后来虽然侯景军队因内讧而瓦解，侯景被杀后南京一带被陈霸先占据，后来建立陈朝，武昌一带由梁元帝占据 续绪梁朝 自此以后 南方一蹶不振 成了小偏安的局面。《哀江南赋》的作者庾信是南朝官吏 描述的就是那一次战火下作者以及广大老百姓的受苦受难情景。什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什么“燕歌远别 悲不自胜 楚老相逢 泣将何及”使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经过了长途的颠沛流离，到达后方的大学生们引起极大的共鸣；作者对当时拥有百万之众的勤王之师不能平定叛乱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写道：“孙策以天下为三分 众才一旅 项籍用江东之子弟 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 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之师，一朝卷甲 芟夷斩伐如草木焉！”这种情况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仓皇西逃的情况何其相似。当时的国文课还常常要写作文，胡济民写了一篇《抗日战争必胜论》。现在回忆起来 当然论点是很幼稚的 但在当时 的确反映了一个青年大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

泰和有一个著名的“快阁”在泰和县城东赣水旁。宋朝诗人黄庭坚被贬到泰和当知县时 写了一首著名的诗《登快阁》。诗写道：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舟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课余，胡济民常和同学们一起去快阁玩，面对着滔滔的赣江，背诵着黄庭坚的诗，浮想联翩。在作文课上胡济民用文言文

写了一篇《快阁游记》。他用丰富的想像说自己在快阁中打了一个瞌睡 碰到了黄庭坚 黄庭坚对他们这些年轻人责以大义：“吾乃贬至此也，汝辈学子，岂能置家国于不顾，效老夫之寄情于山水间乎？”得到国文老师的赞许。

一年级完了后，胡济民从化学系转到物理系。由于一年级的课完全一样，因而转系非常容易。胡济民进浙大后就认识物理系的同学生程开甲，他们两人很谈得来，两人不但常常争论一些“我思故我在”“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等哲学问题 而且程开甲对物理科学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了胡济民，使原来对物理已很感兴趣的胡济民更坚定了转系的决心，觉得不学物理简直是枉此一生。另外，他对物理系的老师怀了很大的尊敬与好感。高年级同学中流传着物理系老师们的两件事。一件事是物理系老师对国民党政府的集体反抗。国民党政府曾派党棍郭任远来当浙江大学的校长 物理系教授束星北、何增禄、朱福忻 包括老系主任张绍忠等，为了反对郭做校长，集体提上辞呈，大家都到山东大学去了，国民党政府只得撤走郭，另委任竺可桢先生来当校长。竺校长从山东大学又把他们请了回来，不但原来的老师全回来了，而且还从山东大学带回了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另一件事是，有一次，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Bohr）来浙大讲学，他是原子轨道模型的倡始人，又对原子核模型有了新的见解，物理系的老师们对他的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陪他与夫人游览西湖时 不断与他讨论原子核的问题 只顾讨论 忘了游玩 玻尔夫人在旁边只能干着急。等到西湖已游完了，玻尔才痴痴地问夫人：“西湖游完了？”显得无限地惋惜。

转系到物理系后的第一门物理课是“力学”那是相当于现在的“理论力学”的一门课 由束星北教授执教。束教授是一个国际上有名望的教授 秉性耿直 平时放浪形骸 不拘小节。讲课时

重点突出 思想敏捷 两眼炯炯有神 课讲得富有启发性 对一个具体物体所受的作用力分析得极其清晰；胡济民后来讲力学时分析力的种种思考方法就是学了这位束老师的。但有时也讲得深奥难懂。他认为课听不懂不要紧，说明学生是在认真听，课后一问、一讨论、一钻研 他就会学深入了，怕的是课讲得学生打瞌睡。他还认为 学到的原理 如果不经过复杂问题的考验 就不能掌握。因而考试爱出难题，常常把大批学生考得不及格，但却深受学生的欢迎。一年级同学进校后第一个被高年级同学介绍的总是他，那次物理系集体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带头人也是他，但他却主张学术与政治分开 反对学生、教师管政治。解放后 他不适应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的阶级斗争形势。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就受到批判，在批判中他还会对学生公开说：“人，你们看是个人 我看都是些分子、原子、电子。”但在浙大 很多了解他为人 的学生都保护他 因而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 他被调到山东大学 在反右时被定为极右分子。“文革”时更受到很大冲击，被迫做打扫厕所等清洁卫生工作，1979年冤案才得平反。在这样坎坷的境遇下，他还在海洋物理及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不少成绩。1983年胡济民专程去青岛山东大学看他，想不到就在前两天他突然因病去世了，终于没有最后见这位老师一面，这是胡济民很大的遗憾。

浙大在泰和并没有停留多久 又向广西宜山进发。一路上或步行、或车、或船 途经莲花、茶陵、耒阳、桂林、柳州 到达宜山。在宜山大家住在城外一些空着的兵营里，实验室也设在兵营中，上课则到宜山城借教室上。刚进行期中考试时，忽然日寇的飞机来了一次大轰炸，把二年级住的一座兵营全炸平了。幸好老师同学们迅速在河边、沟里找到隐蔽之处躲避 人员没有损失 吃亏的是二年级学生 其中也包括胡济民 的铺盖什物全没了 教